

中国奇迹与意识形态范式变迁[※]

郭忠义

(辽宁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增长, 即便是在经济转轨和 2008 全球金融危机中也辉煌依旧, 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奇迹的成因, 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本文认为, 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中, 意识形态决定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供给, 决定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国家的意志, 因此, 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原因是作为党和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的范式变革, 即实现了由政治中心到经济中心、由革命至上到改革开放、由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的历史转变。

[关键词] 中国奇迹; 制度变迁; 理念; 意识形态范式

[中图分类号] 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426(2011)10-0003-04

“中国奇迹”越来越为世界瞩目, 而西方的各种理论对此却无法解读, 于是, 迫切需要我们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本文借助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并完善其经济增长模型, 提出“意识形态范式”的概念并解释中国奇迹的历史创生。

一、中国奇迹及其流行解释的缺陷

“中国奇迹”^[1] 是 1994 年林毅夫首次从学术角度提出的概念, 如今成为世界热议的重要论题。其不断丰富内涵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在 20 世纪末的世界性经济转轨大潮中, 中国在绩效上取得了伟大的领先; 二是中国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 30 年 GDP 年均递增近 10% 的空前经济增长, GDP 总量上涨 30 多倍, 2 亿多人脱贫, 外汇储备和外贸出口世界第一,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三是在 2008 全球金融危机中辉煌依旧。

中国的经济转轨令世界惊奇。由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的发展中中心在 1994 年出版了以中国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论文集, 主编雷森和李在引言中写道“不管什么原因, 两种改革方式之间生产反应的差异实在令

人吃惊: 中国的 GDP 在过去的十年以平均 8% 以上的速率增长, 而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四年却经历了 15% 到 50% 不等的生产下降”。^[2] 几乎所有转轨国家都经历了激烈的经济衰退。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更是经历了现代经济史上最为长久的经济萧条, 有的国家至今尚未走出经济低迷、政治动荡的转轨困局。相反, 同时面临着现代化和市场化两大历史难题的中国, 却创造了转型增长的经济奇迹。包括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多数学者, 将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归之于中俄转轨路径上“双轨制”过渡和“休克疗法”的差异, 但是, 为什么独有中国拒斥“华盛顿共识”, 选择了独特的转轨道路呢?

西方的理论经济学不能解释一个经济体为何持续 30 多年高速增长而没有出现大的经济波动。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经验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不一致。早在 1993 年, 这种不一致就被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称为“中国之谜”。^[3] 20 世纪的发展经济学也无法解释“中国之谜”。它曾依次提出了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各种核心要素: 资本、劳动力、技术、教育与技能培训、资源生产率、创新企业家、产业结构调整, 80 年代后又引入了产权制度。但是, 在这些理论影响下, 除亚洲“四小龙”外,

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增长反而相继陷入“发展困境”。相反, 上述核心要素在中国 30 年中都以国家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形式推动了经济增长。因此,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些学者, 将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国政府采取了适合国情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4] 然而, 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采取这样的发展战略呢?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 中国的持续增长在于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便车, 全球化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5] 同样持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香港学者张五常将中国奇迹归结为县域竞争制度, 归结为经济自由, 并将这种制度视为中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6] 几乎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都以不同的方式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于自由与竞争。确实, 没有市场经济制度就没有中国奇迹, 但是,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导经济理念与政策, 似乎与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原则是矛盾的, 中国的改革理论与政策中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元素明显多于哈耶克的理论元素。政府似乎成为市场制度供给、市场环境营造、市场主体培育、市场秩序维护的关键。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等人沿着林毅夫的思路, 用初始条件来说明中国的经

[作者简介] 郭忠义(1956—), 男, 山东临朐人, 辽宁大学哲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主要为经济哲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奇迹的意识形态原因”(08BKS056)、辽宁大学“211 工程”三期子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的阶段成果。

经济增长。1994 年,林毅夫就提出经济改革可以有两种推进方式,即“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7]秦晖等学者实证地分析了中国转轨过程,在辉煌的背后看到了中国发展中的深层问题,提供了中国奇迹成因的崭新视角;将中国奇迹归结为“负帕累托”的初始条件,和低收入低保障即社会福利制度缺失造成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8]然而,从全球发展轨迹看,“负帕累托”条件下并非必然出现否极泰来的经济增长,却可能出现“路径依赖”式的恶性循环。个别转轨国家至今尚未完全度过社会动荡危机,已经呈现负帕累托状态,却未出现经济稳定增长;至今世界上还有许多低收入、低保障的发展中国家也都与经济奇迹无缘。

2008 年金融危机是战后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不仅在危机困境中率先突围,实现“V”型反转,而且在全球衰退的 2009 年,GDP 依然实现 8.7% 的高速增长,以对世界经济增长超过 50% 的贡献率,成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第一引擎。为什么中国经济在危机中辉煌依旧呢?国内许多学者将危机归咎于新经济自由主义,将中国的表现归结为与新自由主义“最小政府”理念的对立,归结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最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和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促就业、调结构、重民生的调控措施。然而,经济史证明,“强政府”并非与经济增长有必然联系,更不意味着它可以推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措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就认为,中国的增长奇迹在于经济全球化。那么,危机与增长就是同一原因,没有作为新自由主义制度形式的市场经济及其全球化,就谈不上中国奇迹。因此不能简单否定新经济自由主义。由此看来,我们需要超越单一经济学或政治学视野,从哲学的意识形态高度来解读中国奇迹之谜。

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解读中国奇迹何以可能?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就有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现有的西方正统经济学并没有提供答案,中国改革的经验在欧洲转轨国家也无法复制。原因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不能解读中国经验,中国独特的国情与其它转轨国家很难类比。看来解读中国奇迹并说明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必须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这说明中国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与改革开放直接相关。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将全国人民的愿望变成国家意志的国家战略,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巨型社会制度变迁过程。这就说明,离开作为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解读中国奇迹;引入意识形态也就使中国与俄罗斯转轨绩效问题有了共同的解释变量。

意识形态的内涵在社会学、经济学视阈中主要是指宗教信仰、价值规范、风俗习惯等内容,在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视阈中虽然也包括上述内容,但主要内涵是与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意志相关的国家意志,表现为治国理念、施政原则、指导思想及凝结全民意识的价值取向。只要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是自上而下的,就必然与作为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直接相关。

西方经济学家无不对意识形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讳莫如深,西方政要更因其意识形态立场而对此故意失语。国内经济学家也习惯于经济本身叙事,不愿将难以量化的意识形态纳入经济分析。结果都忽略了意识形态这个重要的解释维度。诺贝尔奖得主诺思是个例外,他把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作为解释经济结构变迁的三大基石,认为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技术革命和西方兴起的真正原因;^[9]国家在界定、保护和行使产权上具有规模效益,因而“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10]成功的意识形态能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减少“搭便车”行为,因而决定经济绩效。^[11]

他的理论对中国奇迹有相当的解释力。国家利用制度安排上的比较优势所引导的产权变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线索和实质内容,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俄罗斯政府进行了更为彻底的产权制度变迁,为何转轨绩效不同呢?显然,意识形态在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的方式、路径、规模、顺序等问题上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诺思的理论视界是经济史而不是转轨,其意识形态内涵仅指宗教信仰、价值规范和习惯,对国家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论之甚少。而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首先是指国家意志,因此诺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对

中国转轨及其绩效难以解释。

由此可见,要用意识形态解释中国奇迹,必须搁置意识形态观念的巨量内容,将其作为指导党和政府决策的国家意志,并专注其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核心内容的基本“范式”。意识形态范式是指作为政党的指导思想、施政原则、阶级意识中最为抽象的实践哲学理念,它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全部政治意识形态都围绕着它旋转。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但是不可能照搬经典理论家所有的理论设想和实践道路,必须实事求是地从国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原则进行适应性选择,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作为主导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前的意识形态范式主要由三大核心理念构成,即“政治中心”,“革命至上”和“实事求是”。它是自己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内核和党的实践纲领。翻开《毛泽东选集》和中共党史,全党的思维方式、评价方式、行为方式都以此为核心理念,全部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都围绕着这三大理念旋转。正是在这三大理念指导下,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所谓“政治中心”,是人们观察社会现象时聚焦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时侧重于政治分析,解决问题时习惯于政治方式,评价问题时专注于政治尺度,政治价值优于其它价值,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政策都围着“政治中心”旋转。所谓“革命至上”,是在价值观上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在思维方式上崇尚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两极思考,拒绝中庸、调和、妥协与宽容;在解决社会问题上主张彻底的全面改造和激进的根本解决,反对对问题的微观分析和逐步解决,反对渐进的社会改良;在人生价值上,政治生命、群体价值优于自然生命和个体价值,重信念、信仰等精神价值而轻物质幸福和民生改善。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政治中心和革命至上的理念的哲学基础。然而,随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飞跃及指导实践的巨大成功以及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理论的价值极度凸显,尤其是在 1956 年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从实际出发开始向从理论出发偏移,实事求是的理念被渐渐遮蔽,取而代之的是教条主义的渐渐兴起。

所谓“教条主义”,不仅指将理论绝对化的认识方法和学风,而且指迷信理论、轻视实际、唯书唯上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和思维定势。从意识形态角度说,它与政治第一、革命至上的理念是极易拟合的。一般说来,经济中心,重效益和实际;政治中心,重目标和理想;重实际必然摒弃教条,重理想则易滋生信仰。革命至上,重两极思考和全面解决。重两极思考必然反对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反对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必然产生教条主义。全面解决,必重政治方式而轻经济方式,重激进速变而轻渐进改革。可见三种观念如果整合到一起,就会形成强有力的思维定势。

本来 1956 年中国面临意识形态范式转变的社会发展需求和国际形势契机:战后和平与发展主题初露端倪,赫鲁晓夫改革打破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斯大林模式的教条主义崇拜,国内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结束,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转换,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和主要职能的变化,都要求由政治中心、革命至上的意识形态范式向以经济为中心的范式转变,中国共产党也作出了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地尝试,并取得了以“八大”路线为标志的重大成果。然而,由于伟大的成功经验固化了传统范式的“真理性”精神价值,加之种种复杂的国内国际状况,最终使党的意识形态范式没有随着时代主题、现实国情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而转变。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路径依赖,“实事求是”理念最终异化为“教条主义”(到改革开放前僵化为“两个凡是”),意识形态范式就失去了永葆活力的唯物论基石和社会客观性基础。其后 20 多年间这种范式实际上取得了主导地位,并使前期的转换复归于零,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步入“文革”迷途。

邓小平基于对“文革”教训的深刻反思、对时代特征的深邃观察、对现实国情的正确把握,领导全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范式的重大变革。这就是从教条主义转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政治中心转向了经济中心,从革命崇拜转向改革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在范式转变中,尽管“革命”作为传统意识形态范式的旗帜性话语,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淡出党的政治文件和施政方略,甚至用“第二次革命”指代改革开放。但是,改革思

维与革命思维是有根本差异的。只有从新意识形态范式的改革开放思维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邓小平提出“不争论”那些说不清楚的理论话题,为什么不要抽象地讲“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抽象标准,并用“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党全部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过程绩效的试金石。

其次,尽管“四个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价值观念是“跨时期”的,似乎意识形态上一以贯之,但是,上述内容都是围绕新意识形态范式运转,而且只有在新范式的视阈下,才能得到对中国意识形态与中国经济奇迹关系的正确理解。

再次,“经济中心”与现在我们批驳的“GDP 崇拜”不是一回事。因为与“GDP 崇拜”相对立的民生问题、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幸福感等问题,在范式转换的语境内都是与政治第一、革命中心、精神至上相对立的经济问题。因此,“经济中心”的核心理念在整个“发展中”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是适用的。

三、新意识形态范式与经济奇迹相关性的经验诠释

诺思的经济史研究证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界定和实施及保护产权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12]也就是说,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为之提供稳定的宪法制度和政治环境并致力于经济增长的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他还认为,离开意识形态,所有关于经济增长的解释都面临着无数的困境。

如果将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进行改造(即将意识形态首先作为国家意志并范式化),从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三大变量解读中国奇迹,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取得转轨绩效领先、经济 30 年持续高速增长并成功抵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逐步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制度变迁(经济转轨),即创立了以“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在于中国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不仅在市场制度安排与创新中扮演了积极的主导角色,而且在调控引导经济运行中推出了连续稳定高效的经济政策。而这一切又取决于主导党和国家意志的新意识形态范式。意识形态范式转变是中国奇迹创生的关键。

1.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三大理念

30 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及所有理论创新,无一不是新意识形态范式结出的理论果实;中国所有的制度创新和高效的政策选择,无一不表现出新意识形态范式的实践智慧。

首先,由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变,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全民共识,之所以三年徘徊,就在于教条主义理念的束缚。当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向全党宣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否则就要“亡党亡国”的时候,标志着全党向教条主义精神枷锁的宣战、向党的思想路线的回归,标志着“实事求是”理念开始成为凝聚全民意志的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则说明由“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的历史转变;改革开放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由“革命至上”的思维方式转变为“改革开放”思维。在 1980 年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大的历史选择,这种选择是“实事求是”理念推动的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此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一国两制论、和平发展理论、文明多样性与和谐世界理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所有理论创新都渗透着三大核心理念。

其次,中国政府不断推进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意识形态则制约着制度变迁的改革过程和新的制度安排。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实际上是所有权与用益权的统分调整。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后来的“摘红帽”,都是产权改革牵动的。城市改革的放权让利、承包租赁、以及以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企改革,都是产权改革。实际上,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实质也是产权改革。作为国家宪法制度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更是产权改革。这些改革实质上提高了产权效率,推动了经济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

再次,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先试验后制度化、按照帕累托最优原则或次优原则渐进进行的。国家从

统筹的角度不断适时高效地“供给”以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保证了制度供给的规模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保证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标志的宪法制度的稳定和由此保证的经济增长所必须的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党和政府能够担当这样的使命取决于指导自身决策的意识形态范式,取决于能否实事求是地从国情出发、以经济为中心致力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如果说革命就是划清与革命对象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所有边界,致力于“天下大乱”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营造;改革则需要有立足于经济发展基础上承认并吸纳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全球经济文明、政治、制度文明的开放气度,需要有稳定和谐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经济史证明,革命固然对于打破诺思所说因“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制度“锁定”,具有非常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是革命后的稳定的宪法制度和政治环境下的经济社会改革才能使经济步入快速增长。

2. 中俄转轨绩效差异的原因是意识形态范式的差异

中国的高增长和俄罗斯“失去的十年”是中国奇迹的首要表现。我们认为,表面看来是转轨路径和时序所致,深层原因则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范式决定了东欧、苏联的战略决策选择,新的意识形态范式决定了中国的制度创新。

首先,“休克疗法”施行的历史前提是东欧早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范式的约束,囿于教条主义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模式。中国改革迟于东欧却大器晚成,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通过制度创新创造了经济奇迹。

其次,前苏联改革顺序的政治优先是由于旧意识形态范式对国家决策的约束。戈氏改革采取了政治体制改革优先的顺序,关键原因是“新思维”没有实现革命思维向改革思维的范式转变。邓小平则摒弃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革命思维,实事求是地将改革的成功实践经验置于任何原理之上。

再次,多数学者认为中俄转轨绩效差异取决于路径差异。实际上路径差异取决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范式。表面看俄罗斯选择“休克疗法”是基于“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教条主义地崇尚美国模式、突出政治中心、奉行非此即彼的“革

命思维”的叶利钦的必然选择。邓小平创立的新意识形态范式,不仅创造了由双轨过渡到并轨成功的伟大制度变迁,而且娴熟地达到了稳定、发展和改革的动态平衡,创造了持续增长的经济奇迹。

3. 中国意识形态范式对突破“发展困境”的启示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20 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下半叶则是一个发展的世纪。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反帝反殖运动中,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国家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但是,在战后发展中除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外,绝大多数国家却纷纷陷入“发展困境”。

从一定意义上说,30 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奇迹,是对 20 世纪发展中国家“发展困境”的有效突破,中国的发展理念,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的实践凝缩。宏观审视 20 世纪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发展轨迹,可以看到成功增长的三大要素:经济增长必须建立普适性的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保证资本、技术、劳动力、能源和广义资源的配置效率;有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致力于改革并逐步建立和完善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政府;有一个适合传统和国情并与世界文明兼容的作为国家意志推行的意识形态范式。

当代陷入“发展困境”的国家,或是由于传统经济因政治、文化等原因无法实现市场化转型,或是因缺乏治理经验及迷信西方体制无法建立有效行政的政府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或是在创造短期增长奇迹后不顾国情不切实际地提出狂妄的现代化计划导致政府倒台,或是经济增长后滋生腐败无法解决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而陷入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是作为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没有实现从政治中心到经济中心的转换、从教条主义向实事求是的转换、从革命思维向改革思维的转换。于是造成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的冲突,造成国家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冲突,造成国际关系上中心与边缘的对抗,造成社会上的剧烈两极分化和利益冲突……。总之,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幼稚、致力于发展的政府及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的缺失、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切实际是步入“发展困境”的三大主因。可以表述为是在治国纲领上“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经济中心”理念的缺失。

4.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效率与意识形态范式的相关性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的表现让世界称奇。中国的表现再次改变了经济学教科书的原则,改写了经济增长的历史。中国不仅发育了充满活力的几乎全面融入全球化的市场制度,而且创造了驾驭市场的最强力的政府调控机制,从而成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强政府取决于中国的新意识形态范式。“改革”理念要求改革以秩序为前提,决不能削弱宪法制度和政府权力,相反,政府需要更具权威和效率。“实事求是”要求不迷信任何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所以我们相信市场力量,但绝不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改革”理念决定意识形态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开放兼容的,是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因此,中国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凯因斯主义的强化政府作用的原则,又采用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强调市场作用原则和制度变迁的渐进演化原则。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危机中的增长;没有政府的强大的宏观调控,不可能战胜经济危机。同时,中国政府适时推出应对危机的一系列高效的经济政策,与“经济中心”的理念亦直接相关。

参考文献:

- [1][4][7]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 [2][3]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88,10.
- [5]陈志武.重新思考“中国奇迹”[N].<http://www.sina.com.cn>2008-02-17 经济观察报。
- [6]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M].中译版.2008-12-26 网易财经 <http://money.163.com>.
- [8]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N].2008-02-21 南方周末。
- [9]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1999.
- [10][11][12]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51,20.
- [13]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责任编辑 姚黎君